

# 「廣東文化」觀的建構

## ——評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

● 唐小兵



何謂「廣東文化」？它能否被相對確切地界定在一個範圍之內？「廣東文化」的製造者究竟是廣東百姓還是廣東的知識份子？「廣東文化」觀被建構的歷史動機究竟何在？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認為：「對文化人類學者而言，從一些陌生的不同的觀念中理清其結構，去塑造自己的知識，總是不可避免地要地方化，這與了解其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方法等是密不

可分的。」<sup>①</sup>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熱衷於有關近代中國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的討論，探尋中國式公共領域的發生機制、主體構成、社會效力等特徵，但是由於沒有對「地方性知識」的充分研究作為基底，這種討論往往容易流於浮泛的形式論證和社會想像。可喜的是，這種狀況正在逐漸改變。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程美寶教授的新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以下簡稱《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引用只註頁碼）則是將歷史研究從過度聚焦於中心區域（例如近年來炙手可熱的上海史研究）向「蠻夷之地」的廣東進行「位移」，運用文化人類學與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重構了所謂「廣東文化」這一表象的敘述是如何被歷史地建構起來的過程。何謂「廣東文化」？它能否被相對確切地界定在一個範圍之內？「廣東文化」的製造者究竟是廣東百姓還是廣東的知識份子？「廣東文化」觀被建構的歷史動機究竟何在？作者在交代該書主旨時用了三個否定式的陳述來表達，即該書不是「一個

\* 此文寫作得到華東師範大學海外研修基金資助，謹致謝忱。

地域文化的研究」，不是「一個純粹的『觀念史』研究」，不是「一個地方史的研究」，這是對讀者可能因為書名而產生的「刻板印象」的「消解」，那麼作者的研究意圖和旨趣究竟何在呢？她在導論中作了說明：

本研究企圖以「廣東文化」為例，嘗試把清末以來中國的「地方文化」視為一個命題、一套表達的語言來看，探討在不同的時代，在怎樣的權力互動下，不同的內容如何被選取填進某個「地方文化」的框框。（頁40）

也就是說，作者並非以作為實體的「廣東文化」作為關懷所在，而是以作為歷史意識形態的「廣東文化」觀成為其研究之根本對象，她試圖通過對歷史進程中各個時代、不同角色源於各種動機對「廣東文化」的表述的考察，解說晚清以來，中國的地方文化觀究竟在一種怎樣的機制與情景中被知識份子生產出來，以及所呈現的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樣態與國家認同之間又是如何複雜地糾纏在一起。換言之，作者的目的絕對不僅是特殊主義的「地方關懷」，而是借助對「地方文化」的考察來討論一個普遍主義的問題，學術與政治在歷史空間裏如何交互影響更是作者的關懷所繫。

按照作者在〈餘論〉中的交代，她並不認同二元對立的「基層／民間／地方 VS 國家／官方／中央」的分析框架，並懷疑用這種分析架構來討論中國社會或傳統中國知識群體的「適用限度」。作者自陳其研究方法乃是：

研究中國「地域文化」，不可忽略的是從認同並定義着這種文化的人們

的眼光和世界觀出發，而不可基於後人的角度和認識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研究對象。我們必須透過審視操控着書寫歷史權力的讀書人的「文化觀念」的形成及演進的歷史過程，從歷史批判中拆解自己對「地域文化」的迷信，才能更設身處地去理解定義這些地域文化的人物和他們身處的時代。（頁317）

一方面，作者對「廣東文化」觀的歷史形成抱持着一份錢穆先生所謂的「溫情與敬意」，不以一己之喜憎剪裁歷史，另一方面，作者深受福柯 (Michel Foucault) 等後現代歷史觀的影響，認為「地方文化」作為一種歷史表述，總是與書寫者的權力架構與利益取向無法分割。因此，她細緻地考察了「廣東文化」言說者的身世與立場之間的隱秘關聯。例如，作者認為作為廣東客家文化的「代言人」羅香林，其研究在表面客觀的背後仍舊隱含着「學術與政治」隱秘的牽連，如作者所言：

羅香林同時兼備學者和官員兩重身份，展示了學術和政治如何結合起來，提升他所認同的族群的地位。由羅香林推動的客家研究，在廣東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形成過程佔有重要位置，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在學術研究領域上建立廣東文化觀念的政治議程。（頁259）

依照作者所陳說的旨趣，廣東文化人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嬗變中，在國家認同與地域文化的內在緊張中如何調適其立場與身份，乃是一個貫穿全書的線索。作者沒有停留在國家與地方的簡單對立之中來處理如此繁複的問題，也沒有用

一方面，作者對「廣東文化」觀的歷史形成抱持着一份溫情與敬意，另一方面，作者深受福柯等後現代歷史觀的影響，認為「地方文化」作為一種歷史表述，總是與書寫者的權力架構與利益取向無法分割。

通過對《高要縣志》的編修過程的爬梳，作者充分展現了讀書人與地方權勢集團的互動，同時也展示了讀書人通過「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將民國時期的新「社會內容」填充到「地方志」中去，以左右逢源於廣東的「新、舊勢力」。

文化多元性與社會現代性等時髦話語輕易地「解構」二者的張力。她通過從多層面考察廣東文化人的「歷史表述」的深層困境，比如被建構的「蠻夷之地」與「華夏文化」的血親想像，又如許多廣東知識份子將「粵語」認定為隋唐古音，從而強化自身文化的正統性。這種文化的正統性到了民國以後被演繹成「國家認同」的來源。即使如此，作者仍舊注意到兩者的內在緊張：

廣東士大夫透過科舉及文言寫作能力的表現，可以和北方的士子並駕齊驅，他們之所以一再強調自己的方言的正統性，其實是要加強他們與國家文化及傳統的認同。然而，也由於「寫」和「說」的分離，儘管他們一方面強調粵語屬「中原古音」，但另一方面，卻始終認為粵語寫作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要我們回顧一下粵語寫作的發展歷史，就會了解到，國家意識如何深深影響到人們對本地語言的觀感。（頁118-19）

地方志往往是地域文化和讀書人文化觀念最主要的「表達形式」，也是最能揭示知識份子如何通過操控書寫權力來達到自身社群利益的目的。《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一書自然也沒有「忽略」這個重要的觀察窗口。通過對《高要縣志》的編修過程的爬梳，作者充分展現了讀書人與地方權勢集團的互動，同時也展示了在急劇的社會變動中，讀書人在編修地方志中體現出來的「迎合、權衡與狡黠」，即通過「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將民國時期的新「社會內容」填充到「地方志」中去，以左右逢源於廣東的「新、舊勢力」。質言之，

作者的研究旨趣並不在於對「廣東文化」這一表象進行敘述，而是通過對不同歷史情景中不同讀書人對「廣東文化」的各式表達的「精讀」，精細地勾描當時知識份子的「心靈的歷史」，這種再解讀有效地規避了歷史寫作淪落為「話語的技術操作」的可能，而成為一次次對個體與社群的歷史意識的探險。

作者在完成對該縣志的文本細讀後指出：「民國《高要縣志》的纂修者，雖然都是在清朝獲得功名之人，同時也是民國的新進，他們竭力為自己穿上一件現代知識份子的外衣，也竭力為高要縣套上一身現代和民族主義的外衣。不過，由於他們的教育背景和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有限，在當時大城市的知識份子的眼中，他們起碼落後了半個世紀。他們認識許多『現代』和『民族』的觀念，其實是國民政府潛移默化的結果，國民政府為他們提供了一套熟悉的詞彙，讓他們更容易地表述他們『國民』的身份。」（頁297-98）因此，我寧願把這本著作視為廣東知識份子在晚清到民國的「心態史」來閱讀。

在筆者看來，《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最精彩的章節是對於嶺學源流的考察。通過對「學海堂」的內外網絡與「身後歷史」的比較與再現，作者刻畫了阮元、陳澧、朱次琦、溫肅等士子的形象，展現了他們如何為「廣東文化」爭取學術地位和資源的過程。在這些學海堂人的心目中，學術並不需要與社會刻意地保持距離，反而可以充分地利用「商人資源」、「地方政治」為學術服務，既可以為學術研究提供足夠的資源，也可以開通學術「經世致用」

的渠道。學術沒有被納入國家一體化的計劃體制，可以爭取諸多的民間資源，也許是民國學術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爭取的過程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權力網絡與社會網絡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學術文化為政治權力網絡提供智囊和象徵性資源，而政治和商業的支持又進一步強化學術的「社會影響力」，並為學術的發展提供支持。作者指出：

學海堂成立之年代，正值廣州與西方世界貿易最為興盛之時，從事對外貿易的行商家財豐厚，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和講究，教目睹的外國人咋舌。這樣的經濟基礎，對於推動文化事業，自然大有幫助。事實上，學海堂部分經費，就是來自從事鴉片貿易的行商伍崇曜的。此外，學海堂的學人也和行商有着各種交往和關係。(頁170-71)

地方政治更是潛在地規約了學海堂作為學術文化機構的走向，如作者所洞察的那樣：

學海堂實際上是晚清廣東的政治中心。誰被委任為學海堂學長，其學術取向和成就固然是重要條件，但其政治立場和在地方上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視。全國所認同的學術標準固然是決定誰足以為廣東文化的發言人的基礎，但廣東的內部政治，對於如何定義當代和以後的廣東文化，也起着關鍵的作用。(頁180)

中國古代的政治模式是士大夫主導的士紳社會，而知識份子集中的公共空間往往會對政治產生強大的影響，而這一政治特徵到了西學

開始衝擊「中國」的晚清廣東仍然保持了強勁的生命力。閻步克認為②：

中華帝國的官僚政治以學者(文人)作為官員的主要來源，這種特殊類型的官員構成了一個被稱為「士大夫」的社會階層。「士、農、工、商」這種表述，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特徵性。

這就能充分解釋為甚麼學海堂可能並能夠成為廣東的地方政治中心。

無論是對於廣東的文化想像(即認定廣東為中原文化的分支)的分析，還是對於粵語、廣東民俗、地方志等「地方性知識」的描摹，或是對於嶺學源流的考究，作者的出發點雖是對於地域文化的辨析，但卻時刻可見其對於這種地域文化的內核的「拿捏」，即從晚清到民國困擾，或者說鼓召知識份子最根本的動力是民族主義的激情，甚至是民粹主義的歷史想像。這種分析充分印證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在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的功用，也從地方文化的個案史角度說明了汪暉的論斷：近代知識份子完成了從傳統的天理世界觀到現代的公理世界觀的轉變。雖然作者聲稱自己的歷史寫作是反「觀念史」式的，但是通讀全書，我們卻可以強烈地感覺到一個「觀念論者的幽靈肖像」，即作者認定國家認同與民族立場在晚清到民國的廣東知識份子心靈史中是「壓倒性的心理機制」。

例如，作者在解釋民國民俗學在廣東的興起時，便認為這是接受了西學後的知識份子喪失了自身文化認同後的自我慰藉，「在西方找不着中國，他們也不願意在舊中國裏

作者展現了學海堂人如何為「廣東文化」爭取學術地位和資源的過程。他們認為可以充分地利用「商人資源」、「地方政治」為學術服務。學術文化為政治權力網絡提供智囊和象徵性資源，而政治和商業的支持又進一步強化學術的「社會影響力」，並為學術的發展提供支持。

從制度層面來說，知識份子確實與國家政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疏離，成為邊緣化的知識社群；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在殫精竭慮地尋求填補內心空白的民族激情，試圖迅速建立個體與國家的象徵性聯繫。

找回中國，為了建構一種新的國家意識，他們到群眾中去。」(頁212)在闡釋知識份子熱衷民俗學的時候，作者認為「在民粹主義背後，民國知識份子的終極關懷，仍然是民族主義。這套以統一的中華民族為前提的民族主義，不但主導了他們的思想，還深深地影響着他們的詞彙和語法。在為國家也為他們自己尋求一個新身份的過程中，民國知識份子發現，民間文學和風俗，是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的最豐富的資源。」(頁240-41)相對於晚清到民國知識份子離開鄉村進入城市的整體進程，知識份子到群眾中去或者說到民間去的根本動力，也許不能輕易地用「建構新的國家意識」來解釋，夾雜在這個滾滾人潮中的知識份子，既有尋找革命資源的革命者(如從上海到安源的革命知識份子)，也有對革命失望後的文化浪漫主義者，同時還有逃避現實的投機知識份子，甚至不乏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梁漱溟等鄉村建設論者)。

許紀霖先生認為近代中國是一個「斷裂社會」<sup>③</sup>：

在傳統社會中士大夫階級與國家和社會的有機聯繫，如今都崩潰了。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現代的知識份子與國家不僅失去了內在的體制關聯，而且對國家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識精英離開家鄉，離開鄉村，進入都市，又意味着他們脫離了傳統的民間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血緣、地緣和文化之根。在傳統中國，士大夫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樞，如今他們不僅疏離了國家，而且也游離了社會，成為無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國知識份子到民間去的熱潮，就會發現一個巨大的歷史悖論：一方面，從制度層面來說，知識份子確實與國家政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疏離，成為邊緣化的知識社群；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在殫精竭慮地尋求填補內心空白的民族激情，試圖迅速建立個體與國家的象徵性聯繫(這種象徵性聯繫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卻是非常實在的情感慰藉)。正因為這個原因，民國廣東知識份子的國家認同也就僅僅是一種「抽象的抒情」而已，也就是說，僅僅是一種理念層面的認同而已，到了具體的問題上，「國家認同」成了為自我利益辯護的正當性資源，或者成了打擊異己的理論工具，「國家」與「地方」的衝突在理念的層次被熨貼地融合了起來。作者也注意到廣東知識份子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困局：

地方讀書人在企圖改革地方風俗的過程中，以為自己也在參與建設新的中國文化，但由於在情感和利益的層面上，他們更能認同的是自己的地方，因此，要正面地表現地方特色，只能把地方與國家拉上關係。但如此一來，他們實際上是在削平地方特色，地方觀念和國家觀念的共存和融合，只能是在理念的層面上得到體現。(頁298)

這樣一來，「國家認同」就成了被擱置的「民族主義文化空殼」，地方情感和利益才是決定歷史人物作為的關鍵因素，而事實上在作者的整個論述中，民族主義似乎是「廣東文化」觀的「靈魂」，主導着廣東知識份子的行為取捨和言論，那麼

如何解釋這種敘述的邏輯悖論？國家認同與民族立場到底可否被估量到如書中所言說的分量？如果繁複的「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可以如此輕易地被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敘述」闡釋，那麼中國的所有地域文化似乎都可以在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架構中被理解，這會不會導致用一種普遍主義的論述架構來消解歷史的內在複雜性？正如作者在導論中所指出，作者的本意並不是做一個地方文化的研究，而是試圖以「廣東文化」觀的形成為個案，來研討地方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敘述是如何在權力與情感的歷史空間中形成。這種試圖把個案研究普遍主義化的動機可能會導致作者過度強調了民族主義（即國家認同）在地方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新社會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界正在發生「革命性的影響」，「表象」成為其「文化關鍵詞」，「表象這一概念帶給文化史的東西是最適合玩味的。……新史學不再局限於主題目錄，也放棄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爭，謀求通過語言、圖像和象徵符號等重建表現為『接受』、『發明』和表象鬥爭上的文化實踐。它不僅關注語言和圖像本身，也關注這些對象的交換方式，比如通過書籍、通過社團網絡、通過代言人等媒介進行的交換。」<sup>④</sup>作為一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作者關注的中心問題是，作為表象的文化敘述是如何被歷史性地編制起來，因此重構廣東知識份子的文化實踐、對歷史文獻的解讀以及考察其背後的動機成為主要的着力點。這種努力試圖釐清歷史背後的「心理動機」與「利益考量」，同時也試圖把歧異的各種行為與話語編織進「文化—權力」的論

述架構之中。正因為此，「歷史的首要任務已不是解釋文獻、確定它的真偽及其表述的價值，而是研究文獻的內涵和制訂文獻：歷史對文獻進行組織、分割、分配、安排、劃分層次、建立序列、從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煉出合理的因素、測定各種成分、確定各種單位、描述各種關係。」<sup>⑤</sup>正是這種被後現代史學力量灌注的新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視角，讓作者能夠大膽聲稱其研究是「去地方史」、「去地域文化」的非純粹觀念史研究。

在這樣一種「先入為主」的解釋架構的支配下，含混的、歧異的，甚至衝突的、悖論式的歷史現象（包括對歷史現象的表述）都可以被「圓融而精緻」地予以解釋，「失語的歷史」成為了被新社會文化史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裁割」的對象，歷史自身的豐富性可能就被遮蔽或篩選掉，而無從自由地生長出來。權力和利益成為了解釋人們行為的「萬靈丹藥」。而構成歷史動力的除了是利益以外，顯然還有人類永不磨滅的理想主義激情。例如作者在討論粵語作為一種方言在廣東革命歷程中所起的作用時說：「一個有趣的悖論是，方言的顛覆性幫助讀書人建立新的國家觀念，其淺白親切的特性也幫助普羅大眾學習這新的國家觀念。可是，一旦國家真正建立起來了，方言的顛覆性有可能針對的，就是這個新的國家，其發展因而也就很快被壓抑，而始終維持着一個『方言』的地位。」（頁163）「書寫粵語」真的是一種顛覆性的革命嗎？對粵語書寫更多的是一種大眾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表達形式的「因地制宜」的變更，而認定其為「國家

作者關注的中心問題是，作為表象的文化敘述是如何被歷史性地編制起來，因此重構廣東知識份子的文化實踐、對歷史文獻的解讀以及考察其背後的動機成為主要的着力點。

作者發現「所謂的『廣東文化』，只是以行政界線劃分的一個範疇，至於裏面填塞了甚麼內容，除了順應國家文化的定義的改變而更替外，也是在這個地域範疇裏活動的人群角力的結果。」作者努力所展現的正是「廣東文化」究竟是在甚麼的話語權爭奪中，各色人群輪番上場集體表達的歷史。

認同與地方認同」角力的載體，在當時讀書人的日記、書信或文章中是否有足夠的「自覺的歷史意識」等史料支撐？如何在闡釋歷史變動的原因時避免「過度闡釋」的思維陷阱？

另外，在解釋廣府人與客家人爭奪對「廣東文化」正統地位的「文化鬥爭」時，作者認為：「當文字的操控權不再僅僅掌握在廣府人手裏，當其他方言群的自我意識越趨強烈之後，他們便不一定接受廣府人這種一廂情願的論述。客家人的歷史敘述，便是從一個別人撰寫的歷史，演變為自己寫自己的歷史的過程，更確切地說，是演變為自己意識到自己『是』客家人，並為自己所認同的群體撰寫歷史的過程。這個過程典型地反映出所謂族群之區分，其實是一種發現『己』之意識，然後把『己』和『他』劃分開來的結果。」(頁67)單單用自我意識的覺醒，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釋這一話語權的爭奪戰，並且常常因為反對「經濟決定論」而滑落到另一極端，也就是「文化決定論」的怪圈，這也是新社會文化史「最大的敵人」。因此，對文化書寫權力的控制與反控制背後所折射的，仍舊是政治經濟實力的角逐，如果捨棄了這一思考的維度，歷史就會變成滑翔在大地表層的「意識形態雲彩」，美麗、輕盈而空洞。事實上，作者對學海堂的歷史考察已經充分證明了政治力量、經濟實力對文化、學術的影響。

通過對「廣東文化」觀的歷史陳述的考察，作者發現「所謂的『廣東文化』，只是以行政界線劃分的一個範疇，至於裏面填塞了甚麼內容，除了順應國家文化的定義的改變而更替外，也是在這個地域範疇裏活

動的人群角力的結果。」(頁313-14)作者努力所展現的正是「廣東文化」究竟是在甚麼的話語權爭奪中，各色人群輪番上場集體表達的歷史。在這種歷史書寫中，作者獲得了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最愉悅的精神慰藉：

即使是在動輒以二元對立觀來觀照世界的民國知識份子，在敘述他們定義的地方文化時，也不會把「國家」和「地方」對立起來。這種實際上多元而在表述上又趨向統一的辨證的國家地方關係，恰恰是中國文化最誘人的地方。(頁317)

其實，這也是作為讀者的我們閱讀該書時，在歷史研究方法上獲得的最深刻的印象和啟迪。

#### 註釋

- ① 吉爾茲(Clifford Geertz)著，王海龍、張家瑄等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英文版緒言，頁3。
- ②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465。
- ③ 許紀霖：〈「斷裂社會」中的知識份子(編者序)〉，載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3。
- ④ 伏維爾(Michel Vovelle)著，沈堅譯：〈歷史與表象〉，載李宏圖選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頁15。
- ⑤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6。

唐小兵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6級博士班